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耿云志

耿云志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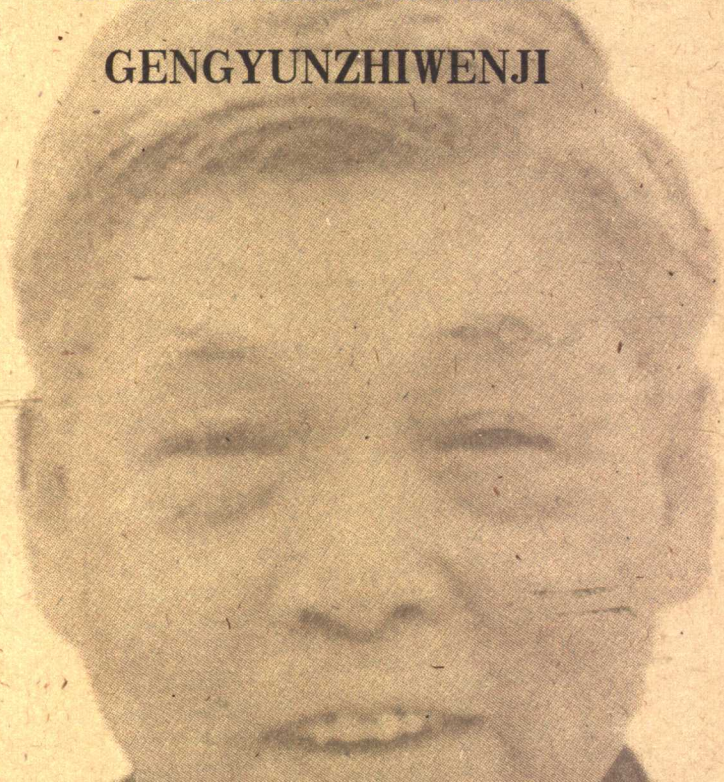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GENGYUNZHI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耿云志

耿云志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GENGYUNZHI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KB7/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耿云志文集/耿云志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772-6

I. 耿... II. 耿...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88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耿云志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75 插页 8 字数 454 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772-6/K·297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进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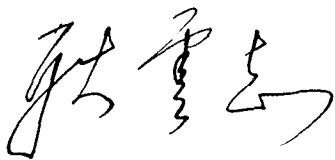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张重志





小
传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是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先后出版著作、学术资料及工具书22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文章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被译成英文）、《论清末立宪派与谏议局》（被译成英文）、《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被译成英文）、《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等数十篇。作为学科带头人，亲手创立了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该室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相继主持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已完成）、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进行中），以及上级委托课题“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进行中）等。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先后应邀在香港、台湾及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多所大学做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

自序

我原是学哲学的，1964 年被分配到近代史研究所，直到“文化革命”后，才真正开始研究工作。但在 1972 年，近代史研究所奉中央之委托，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我是这个研究组最初的成员之一。“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研究组着手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我是四个主要撰稿者之一。这一卷要写中华民国的创立史，实即是写辛亥革命史。于是，辛亥革命史成了我的第一个研究园地。这期间，因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研究胡适遂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完成之后，有七八年的时间，我被安排协助一位老同志工作。同时，也抽时间继续做一些我个人的研究。我的研究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晚清的改革思想与改革运动；一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重点的思想史研究，其中于胡适研究用力尤多。1991 年，在我的倡议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这以后，近代思想史便成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二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了几种专书（其中有两种是合著），也编了几种资料书。与此同时，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和文章，其中有不少颇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一直有人催促我从这些论文中选出一些来编成集子出版。但我迟迟不以为意。这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为每一位委员出一本自选集，我觉得似不应再拖了。于是从 2004 年 4 月起，我开始考虑选择篇

目。中间不断有各种事情打断,直至8月上旬,篇目才基本确定。

现在这本集子,共收论文24篇,札记、随笔及讲演录5篇,另选出书序12篇。这些文章收入本集时,除了必须的文字校改和统一规范注释以外,内容均未作任何改动。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前后相差25年,在涉及同一问题时,难免有少许重复,在提法上也会有轻重深浅之不同。

收入本集的文字,按其内容约可分作七组。

第一组,从研究晚清思想及改革与革命运动的论文中选出5篇。

这里最早的一篇是《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此文于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后,引起的反响很大。因为这是第一篇在大量史实基础上系统深入研究清末立宪运动并给予肯定评价的文章。从那时以来,人们对清末立宪运动的看法,同“文革”前相比,已迥然不同了。

《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一文,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写的一篇长文的缩写。原文三万四千余字,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陈志让先生把它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中文稿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这篇缩写稿是为便于在刊物上发表而写的。此文应用大批从前一直不被人注意的有关各省谘议局的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论述了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文章指出,1909年在各省成立的谘议局是立宪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舞台。立宪派充分利用这个舞台,一方面揭露清政府的各种腐败情形;一方面同地方大吏的专制权力展开斗争。此外,他们还利用这个舞台大力进行全国立宪派的相互联络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发动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一文,是为纪念辛亥革命

九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而写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前一篇论文的续篇。它进一步阐述了作为全国立宪派的联络机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挥了组织和动员全国立宪派及受其影响的群众的作用,使他们逐渐对清政府完全失望而终于站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最终和革命党人一起,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这可看作是我研究清末革命与改革运动的一个基本结论。

这一组的另外两篇文章都是研究清末改革与革命运动中的思想状态的。《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看他们的民主思想准备》一篇着重指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派,他们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准备都是很不够的。虽然立宪派对民主的本质、民主的实现条件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但他们相当地缺乏信心。《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一篇,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的不足,即这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是以建立某种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为目标的革命,实质上是在反满的思想动员之下进行的。换句话说,本来应是民主性的革命,却是在降一格的形式下实现出来的。这已经预示了辛亥革命不可能结出民主政治的果子。

第二组,从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论文中选出 5 篇。

第一篇,《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写于 1985 年,是为 1986 年初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而写的。文章基本意思是要说明,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问题争论不休,反映了人们深深的困惑。要摆脱这种困惑,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我们的文化心态。健全的文化心态,首先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以理性的心态去迎受外来的优秀文化。第二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对固有文化和外来的文化都不要有任何迷信,都要存一种研究和评判的态度。第三是要明白,文化是不可能主观设计其发展模式的,它是全民族共同实践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一文,是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

写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上。此文表面上看去,似乎是专为批评林毓生先生那本被广为引用的《中国意识之危机》一书的。实则大量篇幅是正面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倾向及其伟大历史作用。近十几年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不少批评甚至否定的议论。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在实践中发生种种流弊,理性地认识这些方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主流倾向在历史上的伟大进步作用。

《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一文,本来是为一个当时还年轻的朋友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的编辑朋友拿去发表了(1994年第2期)。这篇文章提出了新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主义。这个基本思想,后来在为参加2004年初在美国举行的研讨会而写的论文(《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中,作了进一步系统化的论述(此文不久将会发表)。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一文,原是我 and 几位朋友合著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一书的结语,曾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上摘要发表过。此文是对近代一百多年里中国仁人志士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的总结。文章指出,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对民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相反地,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却使人感到似乎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于近代思想史的几个问题》,是最近刚刚写成的一篇论文。其中着重谈三个问题:(1)关于和平改革思想,主要以清末的改革思想与改革运动为案例进行分析和论述,因此与第一组的文章关系很密切,可以连贯起来看。(2)关于民族主义,这里提出一个见解,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体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初始阶段尚未摆脱“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出排斥异族的思想倾

向。以后逐渐上升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因世界及中国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先进分子的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即为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斗。我认为这是最高形式的民族主义,如今正在成为世界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潮。(3)关于个性主义,中国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垂两千余年,个性主义一直被视为异端加以压制。近代以来,先进思想家逐渐认识到,是否承认个性主义的价值,是中西文化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他们为个性主义正名,指出它是健全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是一国国民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关键。尽管这一点在近代中国长期未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承认,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个性主义之终于被认同,并得到逐步发扬,乃是无法遏止的必然趋势。

第三组,选了四篇研究孙中山的文章。

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多年来对孙中山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吸引着很多专家学者致力于此,研究成果层见叠出。但在我看来,还有不少问题值得做更深入、更细密的研究。我这里选的几篇文章,就分别在几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主要是表示,我一向不赞成按照改革与革命决然对立的思想模式,把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以1894年为界,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近代中国,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一直是交相迭乘。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是从事和平改革还是从事暴力革命,都是为了救国,并且都是力图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文章还对同盟会的创立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指出,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建立合众政府的目标,是到香港成立同盟会总会时才明确宣布出来。此外,文章还对在香港筹划起义过程中,孙中山与杨衢云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以往的分析。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一文，主要是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并未被多数革命党人真正接受和理解。他们多数人仍是在反满口号的动员下从事活动的。此与第一组文章有密切关系，可参看。

《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一文，是鉴于以往的研究并未深入了解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误以为孙中山是把西方的三权分立改为五权分立，这显然是不对的。我的文章指出，用五权宪法来概括孙中山的宪法思想是很不准确的。孙中山的五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皆在总统领导之下，因此都属于政府权。用政府权来概括宪法思想，显然不妥。按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国民大会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思想岂可将代表人民意志的最高权力机关置于不顾。文章对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也做了分析，指出，他并没有解决无能的人民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如何能驾驭有能的五权政府。因此他的民权思想也就仍未落到实处。孙中山是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但由于中国的复杂和专制主义传统的久远，孙中山还难以解决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国民党的政治实践》一文，指出了从前一直未被人注意过的孙中山的一些深刻思想的闪光。如关于训政时期革命党自身训练的问题，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只是孙中山还来不及做系统深入的思考。但只是这一点思想闪光已足以启发后人。

第四组，收入研究康有为的一篇，研究梁启超的两篇，研究傅斯年的一篇。

在《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及其以孔教为国教说》一文中，我提出，康氏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心灵里培植起一种“圣人”情结，这成为他一生为学为政的心理基础，尤其是成为他创教活动的心理基础。文中指出，宗教至少有两个最必需的条件，一是相信彼岸世界的存

在，二是有组织系统。据此判定儒家基本上不是宗教。康有为为创教的需要而有意地曲解孔子学说。这样，就不可能令多数知识分子相信他。文章还从多方面分析了康有为创教失败的原因，这里不详述。

《略论梁启超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1898年9月—1900年8月)》一文，主要论述梁启超戊戌出亡至庚子勤王时期谋救光绪皇帝的种种活动。其中不少史实，此前未为中国学者所注意。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一文，主要是纠正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梁启超五四以后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文章以《欧游心影录》作为分析案例，证明梁启超五四以后，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仍有许多积极进取的思想和主张。

关于傅斯年的一篇，是因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先生的哲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袁清先生送给我傅斯年1919年8月26日给袁同礼的一封信(复制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遂写成此文。信中反映出，傅氏在五四运动高潮刚刚过后(如果依稍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应该说高潮还并未过去)，就产生非常深刻的反思，实在难得。他关于“改造中国，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改造社会，先要改造自己”；“做社会结合的运动是改造社会的好元素”等等议论，都是极具创造力的思考。他关于“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免得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的警告，也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卓见。傅氏的这些见解，很值得人们深加思考。

第五组的六篇文章都是关于胡适的。

我研究胡适历时较长，用力亦多，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分别结成几种专书出版。这里选录的几篇，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代表性意义。不过我可以指出，这几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都关系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政治以及人格陶养等许多深层次的东西。例如，《蔡元培与胡适》一文，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揭示两人在为学、

为政以及人格陶养等方面的种种异同。又如,《胡适与梅光迪——从他们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一文,其中运用了大量当时尚未发表,至今亦为多数人不易见到的材料,深入分析论证了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还在最早期(胡适归国前)就已显示出深刻的时代意义。又如,《胡适与〈新青年〉》一文,着力揭示了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分歧及新青年小团体分裂的客观趋势和它的时代意义。又如,《胡适与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论争》一文,从总体上论述了胡适对于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教育与文化等各领域的重大问题的立场与态度。至于《胡适私人档案介绍》一文,我倒是诚恳地劝告各位读者,最好是仔细读一读。从这篇文章里,人们可以比较更清楚地认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真实历史地位。《论胡适》一文,原是为《胡适全集》写的序言。大体可以说,它表达了至今为止我对胡适总的看法。

第六组,是几篇札记、随笔和一篇讲演录,也许读起来会比上述那些长篇大论稍微轻松一些。

第七组,是从十几年来为朋友们的著作写的序言中选出来的。各篇大都很短,但都颇能发挥一两个重要的思想。例如,在《张东荪评传》的序言中,对于长期流行的所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说法,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又如,在《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的序言中,我提出,许多人一向把个性主义、个人主义都理解为自私自利;把个性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决然对立,认为两者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其实,集体是个人的联合;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形成一种公共意志;这个公共意志才是集体主义。人们习惯上讲的集体主义,其实只是整体主义。而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又如,在《胡适红学年谱》的序言中,我指出,长期以来于《红楼梦》研究中,历史考证远盛于文学评论,其主要原因,一是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厚积累,二是过于泛政治化的思想影响。

类似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价值。

这四十几万字的东西,虽只是我的著述的一小部分,但大体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个人解读,包括一些特别的视角、特别的见解。也可从中看出,我个人治学的一些心得体会。

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把历史故事陈述一番。尤其重要的是,要对史事、人物与思想作出分析,揭示其内在联系,以见出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从而使我们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当此书将要面世之际,写此前言,以就教于时贤和各位读者。

耿云志

2005年3月

目 录

自序	1
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	1
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	35
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	67
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	105
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看他们的民主思想准备	122
今日中西文化问题	140
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163
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	191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200
关于近代思想史的几个问题	214
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	240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	262
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	285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国民党的政治实践	300